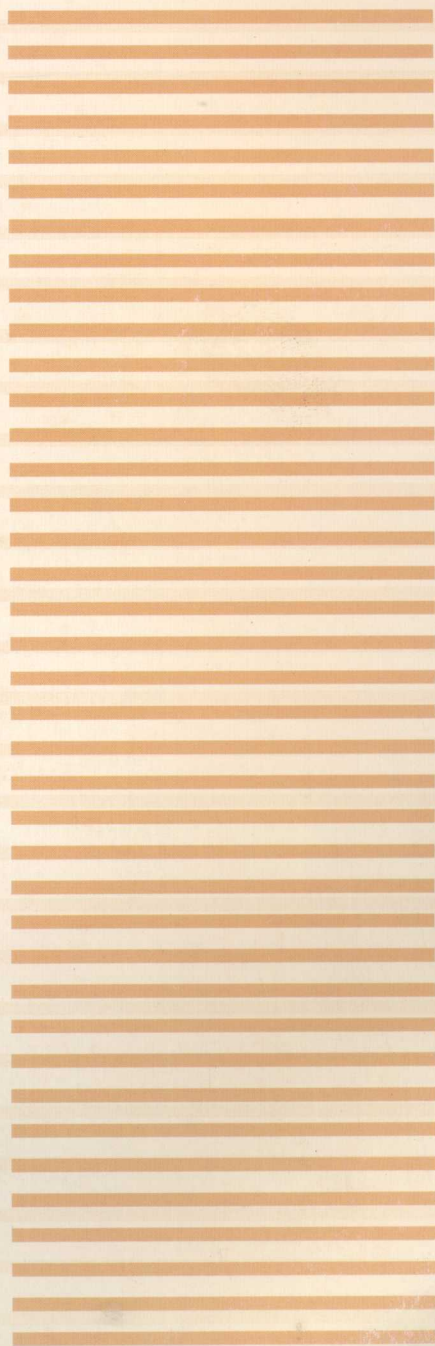


语文论丛

8



语 文 论 丛

(第八辑)

2002 年上海市语文学会年会暨
“沪港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市语文学会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合编

25 上海教育出版 07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文论丛. 8/许宝华主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20—9164—3

I. 语... II. 许...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4062 号

语 文 论 丛

第八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合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448,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 7-5320-9164-3/H·0082 定价:25.00 元

目 录

中国语言学的百年进程	余志鸿(1)
中国语文通向世界的一座现代化桥梁	许宝华(7)
——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回顾,兼评台湾的“通用拼音方案”	
试析中古汉语三等韵 -i- 介音的来源	薛才德(14)
汉语、英语的语音与构词比较	俞步凡(19)
从现代汉语语料库加工看语法研究的意义	韩 蕾(25)
病句理解的语言策略	刘大为(33)
对修辞学若干基本范畴的重新思考	胡范铸(40)
论口语体的基本修辞特征和修辞基本原则	吴礼权(46)
比喻中本体、喻体的关系及相似性	彭增安(50)
论《文则》的“文协尚”原则	王 敏(56)
试论汉语语素的确定与分类	张谊生(61)
词缀“儿”与“子”的替换	王 群(69)
“着”、“在”与现代汉语的持续体	祁从舵(74)
当前语言文字应用的社会问题	张 斌(79)
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范开泰(82)
对外汉语教学与第二语言网络	杨金华(91)
——谈留学生汉语教学的若干策略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SL)语法教学的“语法词汇化”问题	吴勇毅(97)
当前文言词语和成语的误用误写举隅	陈璧耀(102)
略谈日本汉语网络教学之应用	欧孝明(109)
事实报道与话语倾向	黄 敏(114)
——以网络新闻为例试析新闻报道中词语的运用	
法律语言与司法公正刍议	潘庆云(118)
港台文化与上海流行语	刘民钢(125)
语言教学中语气词的规范问题	齐沪扬(131)
论社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建设的作用	王家国(139)

欲望在当下的一面话语旗帜	李明洁(142)
——广告的社会语言学解读	
词义关系研究述评	徐志民(150)
从汉英熟语探讨宗教思想	王德春(156)
汉字字形的应用与汉字字形的规范化问题	陈五云(164)
关于“教学语法”的三个层次及有关问题	陈昌来(167)
现代汉语通论教材编写的创新意识	邵敬敏(171)
关于香港推普的一点想法	范可育(176)
大众传媒与语言文字规范化	赵毅(178)
网话的发展及规范	蒋冰冰(185)
深切怀念建功师	濮之珍(190)
胡裕树先生与中国修辞学	宗廷虎 李金苓(193)
上海市语文学会举行庆贺濮之珍教授 80 华诞暨学术思想座谈会	(198)
濮之珍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200)
中国的“入世”和香港的回归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姚德怀(202)
行动研究——语文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	傅健雄(210)
插上戏剧的翅膀	张秉权(215)
——香港“融戏于文”的经验	
Access 数据库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张再兴(220)
在培植心灵中形成人格	郭金华 任晔(225)
——也谈语文教学中的的人格培养	
为语文教学的根本改革探路	王曙(227)
——论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必要与可能	
关于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研究	肖磊(232)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背诵”“记忆”问题再认识	黄玉峰(241)
整体认知 辩证施教	田立民(247)
——语文课堂教学的思考和实践	
中学语法教学的目标和策略	任芝镁(250)
迎新持旧何艰难——传统诗歌写作教学实践	王晋光(255)
香港大专公文写作教学的一点意见	郭鹏飞(261)
香港大专学生对异形词的使用习惯	黄富荣 李志明(266)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解读	陈阿宝(272)
常用字字理分类教学构想	刘志基(277)
编后记	(281)

中国语言学的百年进程

余志鸿

中国语言学的近百年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萌芽时期,从1900年前后至1949年;第二时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时期,从1949年至1966年;第三时期是中国语言学停滞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第四时期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复苏繁荣时期,从1976年至今。第三时期中国现代语言学几乎被扼杀在疯狂的历史环境中,只有个别语言学家坚持着个体的研究,执著地追求,勇敢地生存,但作为整体的事业几乎可说一无进展。当然按这样的时间段来划分中国语言学百年来的进程是不够科学和准确的,但是我们不可否定,一个学科的发生、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想这样的划分大致还是符合中国语言学进程的实际的。

中国传统语言学分成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它们既是在传统“小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学问,又作为经学、语文学的专科而附庸于“小学”。中国传统语言学有着令中国人骄傲的辉煌成果,我们有世界第一部文字学的字书——《说文解字》,有世界第一部比较方言学调查范本——《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有世界第一部词汇学性质词典——《尔雅》,有世界第一部语源学意义上的专著——《释名》。另外,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音韵学专书。它们以特有的风格充分体现出汉语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语言学的特色。但毕竟因附庸于经学或士人的文学、科举,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发展出独立的语言科学。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内民主思想的上升,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深加强,中国语言学相比之于国内其他学科率先走出传统的思想禁锢,迈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刻和强烈,在中国形成了一支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文化新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语言学方面,“五四”的影响几乎完全具有直接的效应,提倡白话文而因此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汉语文改革运动,使中国语言学研究对象也发生本质的变化,使传统“小学”发展为脱胎而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

呼吁现代语文改革和语言学研究现代化的声音,并非自“五四”始,19世纪末语言学先辈们即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其中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1875 年去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学成归来,“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清史稿·列传》)1898 年中国有了第一部有系统的语法书——《马氏文通》,开创了现代语法学的先河。

第二件,1899 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意外地发现了甲骨文,被王懿荣认识其古物并收购,于是为世人所知重,从此揭开了汉字研究新的一页,兴起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章炳麟则发起改“小学”为“语言文字之学”,开始破除了对经学的迷信。现在甲骨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探讨研究的兴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它的研究甚至已经跨出了文字学本身的范围,与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都产生密切的联系。

与古文字的研究不同,今文字的研究完全转向了现实。“五四”白话文运动也推动了国语运动,于是也就触发了“国语国音”的研究,由此也引起了拼音方案的研制。其实这工作在 19 世纪末就开始了,1892 年卢懋章的第一部著作《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该书以讲述厦门音为主,曾在厦门一带风行,据说“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从卢书出版到辛亥革命,拼音方案就出现二三十种之多。如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1908)、黄虚白《拉丁文臆解》(1909)等。“国音字母”热的出现,也正是中国文字学与音韵学发展走出传统模式的象征。

第三件,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意外地在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内发现了两万多卷六朝以来的写本和部分木刻本,特别是大批唐代的说唱体文学作品、俗讲话本和佛教的经文。敦煌藏书石室的发现,首先是王国维先生,后来是郑振铎先生和当时的一些学人,才开始重视它们的文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例如唐写本《切韵》和藏汉对音等资料,推动了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研究;晋徐邈的《毛诗音》和晋、南北朝、隋代的反切资料等,引起了中古音韵研究的新高潮;具有很强口语化的文学文献,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做了充分的语料准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当推罗常培 1933 年发表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他用汉藏对音研究西北方言,既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也开发了中国方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继而邵荣芬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别字异文和敦煌的诗文用韵撰写了《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从此,敦煌变文的研究成为中国中古、近古汉语研究的新方向。

从中国语言学学科分支情况来看,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发生了积极的转向。

中国的语文学家致力于精训诂、推名物,成绩十分出色。尤其是“以声音贯穿训诂”的原则,不仅有实践的意义,而且有理论的价值。训诂比较注重的是书面语,即所谓“雅”,所以从第一本《尔雅》之后相继出现了数百种“雅”。诸如疑是春秋时期的《小尔雅》,魏晋时的《广雅》、《要雅》,唐代的《石药尔雅》、《蜀尔雅》,宋代的《羌尔雅》、《番尔雅》、《埤雅》、《本草尔雅》,元明时期的《骈雅》、《通雅》、《汇雅》,清代的《韵雅》、《别雅》、《经雅》、《西域尔雅》等,号称“雅学”。通释的语词,自汉语乃至少数民族语言,这些“雅”都是具有词汇学性质的词典著作。训诂从经学转向词典学,已经是个进步。从 1583 年利玛窦到澳门算起,

四百多年来传教士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很可观,形成了所谓的“西洋汉学”。西洋各国均开设汉学课程,编写各种汉外词典。“西洋汉学”的发展,以及当时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训诂式词汇学开始有意识地向现代词汇学转变,胡适 1911 年写的《〈诗经〉言字解》(1921 年收入《胡适文存》卷二)虚实词兼作分析,就是一种尝试。但中国真正的科学词汇学要到很晚才形成,这恐怕得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算起了。

中国音韵学一向被尊为“绝学”,居于“小学”之先。中国音韵学成熟得较早,发展得较快,而且成就最显赫。但是,细观之,则又发觉中国音韵学的转折性进步,几乎与外来文化的传播密切有关。汉魏发展起来的等韵反切之学,显然从梵语音译中得到的启发;之后一般学者与外来拼音文字接触的可能多起来,藏文、满文,乃至西文,以及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带来的拼音原理,在此以前我们只知利用汉字来注汉字的音读。清末一些音韵学大学问家,对上古汉语的音韵现象已经从“类”上有了非常深刻认识并取得了伟大的成果。然而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一步从音值上给上古汉语的声母、韵母进行推测和构拟。直至 20 世纪初,马伯乐《安南语音史研究》和《唐代长安的方音》、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等,由两个外国人领路,对汉语中古、上古语音的构拟,为中国现代音韵学和音系学打开了大门,带来了罗马“音标”,带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方言学在中国一直被学人所重视,可谓历史悠久,成果卓著。清代编修了不少地方志,其中都收有方言部分。1898 年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和杨恭铨《客话本字》出现了以口语为基础的考“本字”,逐渐形成研究活语言的方言学。章炳麟《新方言》虽然仍然属于传统方式的方言研究,但已经为 20 世纪现代方言学的开发准备了基础。19 世纪末西洋传教士为着传播宗教,学习各地方言而常用罗马字就地拼音,无意中开创了方言调查之新风和方言研究之新路。林语堂在《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书目》里曾经说:“搜集及研究中国方言的材料,近数十年来,当以西洋教士为最早,除去翻译《白话圣经》为直接传教之用外,也颇有专为科学趣味而研究的工作……方言字汇一门,尤多专书。此种书因其能用平正的眼光,绝无轻视土话的态度,以记录土话、土腔,说起来或者比我们中国人所著的许多《方言考》还有价值。”

中国以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没有独立出来,而是被作为“方言”的组成来考察的,在扬雄的《方言》里,不少记录的实际上是少数民族的词语,如提到“楚语”的一百九十多处,这些词语中与现代侗台语族有明显音义对应关系的就有二十多个,有一些则与藏缅、苗瑶语族语言有明显音义对应关系(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1993)。这个传统一直被后世继承下来,如清末民初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二卷、《方言别录》四卷和《蜀方言》二卷,据研究里面的“方言”记录,涉及的有僚语、壮语、苗语、瑶语、羌语、吐蕃语、西夏语、南诏语、匈奴语、鲜卑语、突厥语、蒙语、满语、朝鲜语、梵语、波斯语、拂林语、英语、拉丁语等各种非汉语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张永言《简论〈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和〈蜀方言〉》,《汉语论丛》,1983)。汉语研究家因为不了解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间的关系,这种混淆是可以理解的。少数民族中的语言学家对本民族语言的研究在 18—19 世纪已出现不少,如 1838 年拉然巴·阿旺丹达尔编写了《详解月光辞典》(系藏蒙对照词典),1848 年刊行了赛尚阿的《蒙文指要》,1855 年万福厚田《清文虚字指南编》就是满语的语法书,等

等。但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比较研究,则是20世纪随着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后才开始的事。

上文不烦赘述,并非有意贬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也并无夸大西方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之影响;只是想回顾一些历史事实,让我们看到,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初的发展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种可能。中国语言学在选择上,一种从自己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语言学中,依靠自身的活力,借助于丰富的语言资料进行振作和革新,发扬传统理论和方法中的优势和长处,继续进行开拓和发展;一种从国外传播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中吸取营养,扬弃附庸于“小学”的传统,进行全面的改造以求获得新生。中国语言学在建设中,一种继续沿着传统,争取创出一条新的路;一种跟着西方语言学,紧追模仿,亦步亦趋。显然,如果走前一条,中国语言学继续做“经学”的奴隶,将一无出路;但是,走后一条,中国语言学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成为西方语言学的附庸,也将一无出路。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面继承传统一面吸收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终于在一百年的摸索中,开创了一条自己的路,既在分析汉语语言事实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又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

众所周知,50年代开始,中国的语言事业进行了三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是汉语方言大调查,二是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三是汉语语法全民大普及。而这三项工作是与当时的三大语文运动密切关联的,也就是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包括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建文字)和推广普通话。中国的语言学发展,跟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且语言研究与中国社会的语言生活状况、语言应用研究的现实需要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国20世纪语言学事业发展和兴旺的一大特点。汉语规范化工作就离不开对基础方言的认定;确立汉民族共同语并使之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就要研究汉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全国范围的空前规模的方言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客观要求下开展了起来。方言调查培养了一大批语言研究的骨干力量,积累了一大批供深入研究的第一手语言材料,使西方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受到了一次最充分的实践和检验,使中国的丰富复杂的方言现象为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诞生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同样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不仅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得到具体体现和落实,也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不仅仅使曾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语言学在中国遇到了严峻的考验,也为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带来新的发展。1951年《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并破天荒地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组织每个单位学习,实行语法知识的普及。从现实角度看,增加了汉语使用者的词汇知识、语法知识、逻辑知识、修辞知识以及语言的应用能力,有非常实际的意义。从语言学角度看,一方面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分析汉语中发挥巨大作用,语法被视作一个系统来进行处理,同时又为着“规范”的需要,结构主义被充分“中国化”,这为后来汉语语法学的创造性发展建立了广泛而扎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一个来自西方,一个

来自前苏联。前者经过半个世纪在中国的运用,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后者因特殊的政治因素而得到加强。这种不同背景下的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在中国的碰撞,无疑有利于中国语言学的健康成长。有碰撞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学术争论。50年代到60年代,十余年间中国语言学界发生了几场富有意义的学术争辩,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有具体语言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有涉及哲学和思维的问题,也有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问题。在争辩中锻炼了中国语言学者,可惜的是学术争辩被意外地介入了不该有的政治因素,有的学者受到了批判。这是中国语言学向着现代化前进中不幸的插曲。

尽管如此,这一历史时期的成就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有的学术成果已经转化为语文政策并取得了现实性效应。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的地位巩固地确立起来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了;规范语法定为通行的教学语法——“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大型字词书编纂和出版工作启动,第一本规范性字典《新华字典》和第一本规范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发行;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语言学的基础课程或专业课程;受国家支持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建立了,语言学的学术刊物——《中国语文》等陆续创刊;一些本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制定了自己的文字,民族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一样成了独立的学科,汉藏比较语言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等等。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学迎来学术繁荣的春天。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研究生,学术刊物陆续得到恢复,学术团体像雨后春笋呈现蓬勃生机。学术研讨活动频频开展,中国语言学发展进入了本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四个历史阶段——复苏繁荣期。当初参加语言调查的生力军,虽正步入老年,他们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感召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培养新一代的责任。成百上千的语言学研究生投身于语言学的各类专业。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中青年语言学者出于学术追求的热情,也成立了新型的语言学学术沙龙。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1)对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悬而未决问题,如“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语法与语义”、“语系归属”等问题继续深化讨论。(2)打破了结构主义和规范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个性风格和多角度的研究模式。(3)冲出语言学封闭型的研究框架,建立起众多具有生命力的交叉学科。(4)语言理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提倡“三新”——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强调四“结合”——国外语言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语言现象“结合”,广泛社会调查与分析研究“结合”,老一代学术带头人与中青年学者科研“结合”。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1)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成为语言学的领先学科,语法研究走向系统化、细密化,语法与语义、语用结合,历时比较与共时分析结合。(2)历史语言比较学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同族词深层对应理论和语音变异理论,通过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和民族语的研究,发现了新的规则。(3)应用语言学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语言研究科学化和语言研究产业化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其学科地位的重要性。(4)一些新生的交叉型语言学虽然还刚刚萌芽,但已经充分显示出巨大活力,尤其在汉字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

学、认知语言学 and 话语语言学等方面。

四

以上仅仅数千文字,自然不可能全面概括中国语言学一百年来的变化,即使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概貌来介绍,也必然挂一漏万。本文原来是为已经编纂完稿的《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卷)写的“前言”,许多问题将在书中详细展开,所以只是十分概括地以时间(历史发展)为线索,就近百年四个历史阶段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并行发展的情况,做一共时简述,略作评议。当方家学者有机会读到全书时,但愿本文能提供一些参考。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中国语文通向世界的一座现代化桥梁

——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回顾,兼评台湾的“通用拼音方案”

许宝华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可圈可点的大事,就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并经 1958 年 2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和使用。其群众性之广泛,出台之慎重,前所未有。《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也是举世公认的:无论是字母形式的选择(拉丁字母)、语音标准的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音节的拼法(音素拼写法)、还是字母形式与汉语语音的配合(基本不超过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标调方法(符号标调法)、音节的分界(兼采“变字”、“加字”、“加符”三法),及至字母的名称、体式和顺序等,都是既充分考虑汉语的特点,同时又尽量与国际习惯接轨的。可以说《汉语拼音方案》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创制拼音字母的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语文通向世界的一座现代化桥梁。

然而,这是来之不易的。回顾历史,有助于加深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认识。

汉字为非拼音文字,笔画繁复,字数众多,读音纷乱,给读书、识字、接受教育带来困难,于是古人很早就为汉字寻找注音之法。汉代以降,经籍注疏中常用譬况、直音等法注音。譬况者,以音同或音近字的读音比拟被注字的读音。如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𪔐,读似质,缓气言之者,在舌头乃得。”《经典释文·毛诗音义》:“逮音求”、“乐音洛”等。此类注音方法受表意汉字的束缚较大。汉魏时期创制的反切法,以两个字切出一个字音,已涉及对于汉语字音结构的分析,因而比起譬况直音等注音方法来,反切法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如“孔,康董切”,这里的反切上字“康”表示“孔”的声母“K”,反切下字“董”表示“孔”的韵母和声调“ǒng”,声母和韵母(包括声调)一拼,就切出“孔”的字音“kǒng”来。

反切跟读若、直音比较起来,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从汉语音韵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反切这一注音方法的产生,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人们从此懂得了对汉字所代表的汉语音节作音理上的分析,把一个音节分成声、韵(包括声调)两部分。然而用反切注音,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有些窄韵,不得不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以致切音不准确。对反切的这类局限和缺点,后来虽不断有所改良,但始终都受到表意汉字的束缚,因都是以整个汉字的音节来注音的,

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

约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此书为突破汉字注音的形体限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滥觞。罗常培氏根据此书所撰文章的汉字和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第一个包括 26 个声母和 44 个韵母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继利玛窦之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 1626 年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制订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的出现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代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后说:“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两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因此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才纷纷进入中国,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才迅速发展起来。

西洋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的。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这些代表性城市的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也就比较早。如传播得较早较广的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 1850 年。据说仅在 1921 年印售的“话音字”读物就达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为便于在华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英国人威妥玛,于 1867 年出版了一部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汉字注音的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述集》。由于书里头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接近英文,用途日益扩大,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被称为威妥玛式,曾使用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 1977 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威妥玛式之后,西洋人用拉丁字母制订的汉语译音方案中又产生了一个邮政式方案。19 世纪 80 年代(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此事的实权当时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拼成 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 Canton)外,邮电地名的一般写法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但分尖团音,韵母形式也略有差别。到后来地名的写法完全采用了威妥玛式。

此外,西洋人还曾为汉语设计了一种可用于“方言际”的拼写方案。如 1931—1932 年,天主教传教士法国的亨利·拉玛斯和加拿大的欧内斯特·嘉士明合作制订了“辣体汉字”方案。“辣体”者,“拉丁体”也。据《广韵》音系的汉字古代读音设计。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复杂得多的语音条件,并规定对同一方言内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使一个方案在不需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语音,以此解决方音分歧和拼音方案中的同音词问题,从而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设想很是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非常复杂,实用价值不大。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可知汉字注音和拼音史上,除中国人自己创造直音、反切等方法外,西洋人也早在差不多四百年前就开始为汉语汉字拟制注音和拼音方案,中国人由此得到启示:汉字可以脱离用整个汉字注音的方式,采用字母形式为汉字注音为汉语拼音,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的方向。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清朝政府一连串的失败和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国日益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举国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一部分人认识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如卢懋章认为“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下形成了清末的切音字运动。1892年厦门卢懋章发表他所设计的拼音方案,叫做“切音新字”(厦腔),开始了中国人自觉的拼音化运动,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二十年间,人们提出了近三十种拼音方案,其中汉字式字母的约占一半,拉丁字母式和速记符号式各占四分之一。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官话拼音方案。从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之多,可谓成绩卓著,王照因而成为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1910年,清政府因政治原因查禁了官话字母,封闭了“拼音官话书报社”。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给汉字注音工作带来了新机遇。1912年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通过了《注音字母方案》,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其特点:(1)注音字母形体是汉字笔画式,符号选自古代简单的汉字。(2)注音字母虽然不是纯音素字母,但它的表音功效比传统注音的直音法和反切法要强得多。(3)注音字母的拼音法为声、介、韵三拼法,比清末双拼制的切音字也进了一步。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在文化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文学革命”口号的影响之下,深入开展了汉字改革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认识到:注音字母不便于“词类连书”,如果不限于为汉字注音,还要拼写汉语,以至使用拼音文字,那就不用注音字母,而一定要采用拉丁字母。1923年,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通过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决议,1925年制定一份《国语罗马氏拼音法式》,并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非正式公布。1928年,《国语罗马氏拼音法式》正式公布,并开始做推行工作。但当时的民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繁琐、难学,妨碍了普及和传播。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工作就走向低潮了,代之而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29年,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吴玉章、林伯渠等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在苏联华侨中用于扫盲,称为拉丁化新文字。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合于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具有广泛的群众性。1933年传来中国,得到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支持。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籁士等688人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认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经验和学理的结晶,“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138页)据统计,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成立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从1934年4月到1937年5月,出版了书籍61种,约十二万册。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有36种新文字刊物创刊。1935年,延安设立“农民新文字夜校”100所,苏区教育部也曾大量举办“拉丁化干部训练班”,经常派遣教师到农村和工场去教拉丁化新文字。红军士兵能写新文字的约有两万人。(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133—136页)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1938年3月,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叶籁士、焦风等与国语罗马字宣传者王玉川等在汉口就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使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宣传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促进了语文联合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抗日战争期间拉丁化新文字推行的基本情况是: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等地,因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文字运动无大发展。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因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推行效果良好。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吴玉章则接连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等文,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但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文字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成立,到会代表一千多人,大会公推毛泽东、孙科、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组成名誉主席团,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组成主席团。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讲话中宣布边区政府已在法律上给予新文字合法的地位。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除陕甘宁边区外,新文字在其他解放区和新四军、八路军中也得到积极推行。

解放战争时期,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周建人、吕叔湘、陈望道、郭绍虞、倪海曙、方光焘、俞敏、魏建功、史存直等人继续宣传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不少不同见解的拼音文字方案。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六十多万字)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重版。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期间,胡愈之、陆志韦等纷纷撰文,呼吁在建立人民政权后,继续完成五四运动以来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工作。

从 19 世纪末叶 1892 年卢戇章的切音字方案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语罗马字、到 30 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这些注音和拼写方案的制订、试验和推行,可以说是始之于近三四百年前西洋传教士拼写汉语汉字的拉丁罗马字方案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创制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

《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1955—1957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现在汉语拼音字母已普遍用于全国小学的语文教学,并在推广普通话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教学和学习的工具。还普遍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用于各种产品的型号标记,用于辞书和百科全书的条目排列顺序,用于书刊的索引,用于视觉通信和无线电报,用于聋人的手指字母。1977 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中国对外书报文件和出国护照中的汉语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

《汉语拼音方案》与中国现代历史上四种主要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相比较,它兼采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威妥玛式拼音和注音字母之长,用独立字母 j、q、x 表示ㄐ、ㄑ、ㄒ,使全部声母都没有同符异读的不便。由于采用拉丁字母,汉语拼音字母不仅便于为汉字注音,也便于“词类连书”,拼写汉语,这就克服了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不便连写的一大缺点。

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使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序言》)

在台湾省,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旧有的注音字母。应当承认,注音字母在注音识字教育和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它不是音素字母系统,只能作为汉字注音符号,采用的汉字笔画式字母,不仅不能用做汉语的拼写体系,也不便于在国际上使用,因而已经不能适应今天高速发展的台湾社会的实际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完全可以采用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以及科学性很强的《汉语拼音方案》,以取代原来的注音字母,但台湾当局没有这样做,却推出了一套“通用拼音方案”,以与《汉语拼音方案》相抗衡。

所谓“通用拼音方案”采用的也是拉丁字母系统,包括声韵调三个部分。其中声母 21 个:b p m f d t n l g k h j i c i s i j h c h s h r z c s;韵母 37 个:a e i o u e r y u a i e i a o o u a n a n g e n e n g i a y o y e y a i y a o i o u i a n i a n g i n i n g u a u o u a i u e i u a n u a n g u n o n g y u e y u a n y u n y o n g;声调 5 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阴平不标调,其他声调的标调符号和办法跟《汉语拼音方案》相同。显然,这个“通用拼音方案”是在对《汉语拼音方案》略加改动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主要的改动有以下 5 点:

- (1) 把《汉语拼音方案》的 j q x [tɕ tɕ' ɕ] 改为 j i c i s i;
- (2) 把《汉语拼音方案》的 zh [tʂ] 改为 j h;